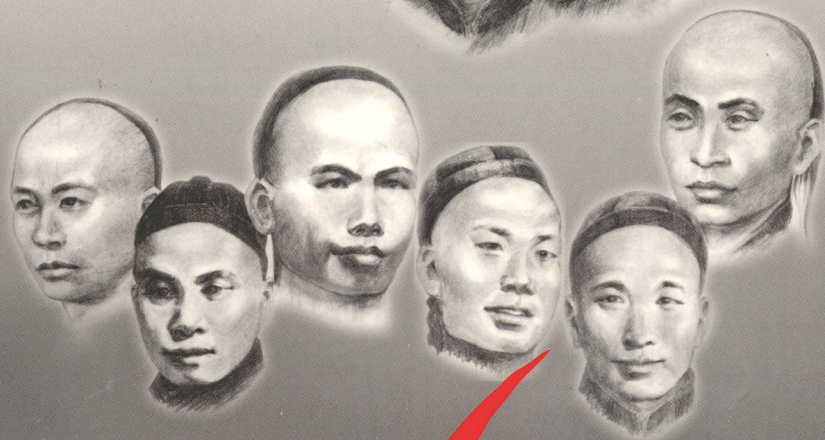


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专辑

1898—1998



第七辑

宣武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宣 武 文 史

第 七 辑

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8年6月第一版 1998年6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8.5 字数 180千字

印数 1—2500册 工本费 12.00元

(内部资料)

京准字 98—0166

人間正道
是清茶

戊戌維新百季紀念

趙永



编者的话

1898年6月11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它以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的1300余名举子于北京宣武区达智桥的松筠庵发起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为起点，拉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一时间宣传维新思想，提出变法主张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但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致使这场震惊中外的变法运动最终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而告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但它毕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的尝试，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的先河。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北京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活动中心，而宣武区又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策源地。这里有公车上书的遗址松筠庵；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杨深秀等维新志士曾居住过的会馆；有强学会、保国会等学会组织的活动场所；有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中外纪闻》的出版地；还有慈禧太后镇压变法运动，杀害六君子的刑场菜市口。因此这里不仅留下了当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为变法呐喊、奔走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学习、工作、居住、生活的遗址，维新志士这些作为爱国改革精神的历史见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当年变法活动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同时也要把改革先驱当年的活动遗址给以很好的保护，使之成为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也是我们在100年后的今天对戊戌变法最珍贵的纪念。

为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我们从1997年以来便着手搜集、

研究有关资料，曾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走访有关人士。此外，我们还组织了部分政协委员、撰稿员对戊戌变法在宣武区的活动遗址进行视察。这一活动受到区政协的高度重视，政协主席阎三和，副主席康景芝、陈志嘉、马铁汉等都亲自参加了视察活动，并就这些遗址的保护问题提出了建议。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为内容的《宣武文史》第七辑终于付梓了。这本书不仅搜集了有关康、梁等维新人士的资料，同时也搜集了部分清廷官员及其他人士参与、支持变法的资料，力求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戊戌变法的情况。在整理、编辑这本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关心热爱文史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刘桂生，清华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岳升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贾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纬堂，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毓良，北京中华印书局编辑马忠文，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李隆庚，北京《燕山油化》报编辑赵思敬，原《北京机械》报编辑崔金生，北京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燕翔书画学会秘书长白鹤群，北京《博物馆丛刊》编辑刘高，广东新会县史志办顾问、助理研究员陈占标等先生亲赐稿件，提供资料。此外，我们还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故乡——广东省南海县政协和广东省新会县政协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整理、编辑中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学者、政协委员提出宝贵意见。

1998 年 6 月 8 日

**政协宣武区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以姓名笔划为序)

主 任：赵 永

副主任：王清风 张洪诰 林 岷 (女)
赵淑珍 (女)

委 员：王殿清 关仁杰 孙兴亚
李金龙 张均康 陈锦云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人员

赵 永 居舒年 赵淑珍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戊戌变法百年祭·····	林 岷 (1)
宣南士人文化空间与戊戌维新·····	刘桂生、岳升阳 (5)
戊戌变法浅谈·····	马 捷 (12)
康有为在宣武·····	白鹤群 (20)
康有为关于设兵校的奏折·····	王铭珍 (31)
《广艺舟双楫》简析·····	赵 永 (34)
康有为脱险记·····	马铁汉 (40)
南海会馆访故人·····	李金龙 (44)
梁启超故居——新会会馆·····	白鹤群 (48)
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	吴其昌 (50)
任公后人皆爱国·····	陈占标 (55)
浏阳英杰谭嗣同·····	马毓良 (65)
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	吴哲征 (71)
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概述·····	贾 维 (75)
谭嗣同情系陶然亭·····	张述云 (102)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	崔金生 (110)
《狱中题壁》别站 ——纪念谭复生烈士就义百年·····	姜纬堂 (115)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考·····	王克昌 (124)
甲戌初雪访谭嗣同故居·····	谭恒昶、杨铭山 (127)
谭嗣同喜藏菊花石砚·····	赵 永 (130)

杨锐与四川会馆	白鹤群 (133)
杨深秀与闻喜会馆	白鹤群 (134)
林旭、徐致靖轶闻二则	孙兴亚 (136)
戊戌政变时的军机四卿	马忠文 (139)
戊戌变法史料拾零	赵思敬 (150)
菜市口刑场谈往	王克昌 (160)
记公车上书遗址	王殿清 (169)
广西会馆中的戊戌名人	白鹤群 (172)
粤东新馆与保国会	吴哲征 (174)
强学会的活动场所	白鹤群 (179)
宣南会馆	
——戊戌变法的摇篮	白鹤群 (182)
《中外纪闻》的创办与影响	王铭珍 (184)
光绪囚禁瀛台	张 燊 (187)
翁同龢在变法中	马 捷 (200)
致力变法维新的徐致靖一家	叶祖孚 (205)
戊戌维新中的幕后人物张荫桓	马忠文 (208)
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	寇长城 (216)
戊戌变法后被治罪的官员	赵思敬 (222)
支持变法的梨园名伶	刘松崑 (226)
戊戌变法中的田际云	吴增彦 (229)
京剧《铁公鸡》轶闻	刘松岩 (235)
慈禧抢先政变的因素	陈锦云 (238)
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纵谈	李隆庚 (242)

附录：

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保护戊戌变法

在我区的遗址的建议·····	(254)
有关戊戌变法的部分参考书刊·····	(257)

戊戌变法百年祭

林 岷

1998年，一个不寻常的365天，这一年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百岁诞辰之年，也是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又是康有为诞辰140周年和梁启超诞辰125周年。戊戌维新运动，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死存亡危机的情况下，始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康有为宫门上书，随后梁启超等人亦上书，并编报纸，提倡变法。反对丧权辱国条约中割让国土之事，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寻求近代化而倡导的一次最初尝试，故此历史事件亦被称之为康梁变法。因而它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同时也对当今社会有着重大的启迪和借鉴的现实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其鲜明的特点：一是爱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二是维新，要求改革，以废八股、废科举、办教育、中西学并重，培养人才，并请求民权，把中国从一个“以农立国”改变成“定为工国”，更谈到“独夫”当诛之，从封建的君主专制独裁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的目标。这不仅在当时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就今天而言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世界上有着法国式和日本式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里指出：“日本人

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领导者，试图仿照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企望通过改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中国。为此明确提出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发展资本主义，兴民权、开国会，变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让新兴的资产阶级参加政权，使中国成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国。

康有为在《强学会序言》中说，现在中国的局势是处于“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因此，他呼喊“凡有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他认为，中国同胞正在“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未有之奇变。”梁启超更认为中国已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上，他在《南学会序》里呐喊：“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蕃属不知谁氏之好，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从康、梁这番肺腑之言，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变法，正是为了自强，而自强的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中国，避免亡国灭种。

尽管康、梁等人的改革方案，有着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幻想，后来甚至堕落成为保皇派，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反对用武装手段推翻满清王朝。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完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带有要求用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这个意义非同寻常，也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同样，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这场运动的两位主要倡导者，他们的历史业绩和历史地位也是不能抹杀的。正是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给清末万马齐喑的沉闷社会带来一股清新，一派新风。这样，终于出现了难忘的1898年——“百日维新”。

在那短短的 103 天中，康、梁等人力求实现变法维新的主张，他们通过一个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布了一批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除旧布新的新法令。遗憾的是改良派和皇帝都无真权实力，所以，在顽固派联合反攻的情况下，维新就只能维持百日便失败了。结果是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离国出走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悲壮地宣告结束。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怯懦的，但是戊戌维新运动进行的时候，正是这个阶级“上山”时期，因而也是它政治上最辉煌的时代，所以这个阶级的代表，不乏表现出一个新兴的、上升时期的斗争勇气。康有为竟敢向“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言词慷慨激昂，毫无忌讳，甚至斗胆地说出“不忍见煤山前事”这样的话，在君主专制时代，是要招杀身之祸的。光绪帝恰恰被康有为这种不顾生死的精神所感动。改良派敢于大胆宣称君主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宣称一向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宗成法”必须改变，这在当时，是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当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置于危境时，康有为、谭嗣同等还敢于策划谋杀擅权的西太后，以便把维新事业进行到底，这个举动虽然因袁世凯的叛卖未能成功，但再次说明维新派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是有胆有识的。此外，维新派坚决主张废八股、废科举，废缠足，改官制，不顾数以十万计的官吏和封建士人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果敢行动。实际上，当时确有不少顽固派人物纷纷上书攻讦维新派“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今天，我们实事求是、换个位置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处境，也应当承认他们是勇敢的。至于谭嗣同为了实现改革理想而慷慨就义，就义前曾在狱墙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悲壮之举。同时就义的还有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史称戊戌变法六君子。就义时菜市口刑场，围观者满巷，人多为之落泪。谭嗣同神气不变，

真英雄也！回顾百年前，他们为改革奋不顾身的精神，正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国之魂，并值得后人永远钦佩、继承、发扬光大。

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却产生了三个直接后果：一是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树立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新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作用；二是它对新学的传播，对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对新知识阶层的产生，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是引出一个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引出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也使得清王朝不能按照原样继续统治下去，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搞起所谓新政策。

戊戌年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挽救国家危亡所作的努力和斗争，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次表现。资产阶级勇于改革的精神，所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在今天仍不失借鉴价值。因此，我们应当很好地纪念它、研究它。

作者简介：林岷，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史馆馆员、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宣南士人文化空间与戊戌维新

刘桂生 岳升阳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事件又是文化运动，作为文化运动，它的中心并不在皇宫大内，而在一批士人学子之间，它兴起和活动的地域主要在北京外城的西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宣南地区。为什么宣南会成为戊戌维新的策源地，为什么在天子脚下会有这样一块涌动着新思潮的土地，这要从宣南士人文化的空间结构来加以分析。

宣南士人文化空间的形成

宣南地区是北京城市的源头，已有3千年的建城历史，它所经历的沧桑巨变为北京其他城区所未有。辽金时期这里地处国都的中心地带，元代成为附属于大都的南城，日渐荒凉，明初变为郊野和关厢。明朝嘉靖年间建起了外城，才又成为北京城的组成部分。但即便此时，这片外城也主要还是发挥着关厢的作用。清代特殊的旗、民分城居住政策，使外城一下子集中了许多的城市机能，造就出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最集中地体现在外城的西半部，这就是“宣南文化”。

清代的旗、民分城居住政策始于清军入城伊始，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城后，立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东、中、西三城居民被迫迁出。同年十月，顺治在即位诏

书中正式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兵就是八旗兵，民就是原有的居民。顺治五年（1648年）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北京通史》），除八旗中的汉人、僧道和直接为官府服务的一些汉人外，其他汉人都只能居住在外城。最终，在北京城中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局面。

这一措施使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内城成为八旗驻防地，原有的城市机能大部分被摧毁了。为防止八旗的堕落，清廷一再下令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不许在内城开设旅店。随着商人迁往外城，内城的商业受到沉重打击，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也多是些小铺或入城负贩者，无法同外城相比。外城则摆脱了关厢的地位，成为北京城市商业、服务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形成北京的商业和服务业中心。同时，按照清朝的规定，外来进京的非在旗人员是不能住在内城的，他们只能暂住于外城。于是外城又成为人口流动的集散地。

外城在社区特征上又可大致分为商业聚集区和士宦聚集区，前门和崇文门外以商人聚集为主要特色，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宣武门外以士人、官宦的聚集为主要特色，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国士人最为集中，知识最密集的地区。今天我们所说的“宣南文化”，尽管包含了商业文化，但它的主体是京师汉人的士人文化。

清代来京士人为何多居住于宣南？清代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是其重要原因。但外城很大，士人为何偏爱聚集于宣南？进京应试的举人多经涿州过卢沟桥进入外城，首先会落脚宣南这或许是其原因之一。何况，去西山郊游或去海淀御园朝见皇帝，住在宣南总比住在崇外便利些。但除此之外，恐怕还有继承明代传统的因素。明代，前三门外已显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崇文门距大运河近，是商人往来的地方，在明朝中叶已成为全城各门的总税关。士人们当然不愿在此落户。而宣武门内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当

时北京城中“勋戚邸第在东华门外，中官在西安门外，其余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史玄：《旧京遗事》第6页）。官员们集中在宣武门居住，于是宣武门外也就成了官员们常去游乐的场所，有了不少官宦人家的宅院和别墅。当清兵将内城居民赶向外城后，士人们在宣武门外聚居下来也就在顺理成章之中。

由于士人聚集宣南，会馆也就特别集中。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是其鼎盛时期，据王世仁先生的研究，旧时北京具有一定规模的正式会馆有380多家，宣武区十有其七（《宣南鸿雪图志》第20页）。当然，会馆并非都是为了士人而设，商人也是会馆的常客，有的会馆完全就是商人的会馆。但宣武区的会馆更多的还是为士人服务，以至在士人笔下会馆“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程树德：《闽中会馆志序》），被看成士人的专有物。会馆是同乡的公有财产，常选同乡中有威望者轮流掌管，许多会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会馆的出现，为进京的各地士人准备了理想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专为同乡士人服务的场所，它对于士人的集结、交往、形成社会能量提供了特殊的环境。有名者如清初的“燕台七子”，康熙年间的“海内八家”、“都门十子”，嘉庆年间的宣南诗会等等，都是当时的士人集结。

宣南文化在京师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清初已经奠定，它表现于学人幕府的活动之中。中国的士人与官僚多为一体，官僚常出自士人，士人也常以宦途为奋斗目标，许多未能入仕的士人则游幕于官宦门中，成为幕僚、宾客，为那些掌了权的士人服务。清代盛行的幕府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士人的集结。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成为游幕的中心地带，宣南地区是其活动中心。清初最重要的由学人组成的幕府要数徐乾学幕府。这位康熙年间在半截胡同开设碧山堂馆邸的徐尚书，为康熙九年（1670年）探花，康熙时他和他的弟弟徐文元奉命纂修《明史》，他出任总裁官，后又负责《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还组织学者编修《通志堂经解》和《资治

通鉴后编》。因此在他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问家。首先住进他的碧山堂的，是史学家万斯同，随后胡渭、阎若璩、黄仪相聚于徐幕，又有刘献庭、王源、黄百家、顾祖禹等先后集于徐氏门中。其弟子韩 TAN 称：“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侈就另院以居之，登公之门者甚众。”（韩 TAN：《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有怀堂文稿》卷十八）成为宣南显赫一时的士人聚集之所。宣南一时成为发现人才和成就人才的地方。

清朝后期学术中心逐渐移向东南，但宣南仍是京师士人汇集之所，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1840 年）入京，大半时间居于宣南，其中宣南的交游及在京师的任职，为其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士人在宣南活动的轨迹：频繁忙碌的交际、应酬，学问的切磋，诗文的唱对，人际关系的培植，同乡情结的发扬，这一切尽现于这块有限的空间之中。士人的相对聚集和大量的会馆，无疑为士人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龚自珍在京任职数年，除了频繁的社交活动以外，他有感于时事之变，利用京师优越的藏书条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他日后的活动积累了知识，走向了经世致用的道路。

士人的频繁集结和流转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形成康乾时期以京师为重镇的文化复兴，它的影响远播于全国。与此同时在官人邸第和会馆之中，也造就出一些相对自由的士人活动空间，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士人在一起论道问学，吟诗唱和，关注时政，这是一个信息通道，进入它就犹如进入了“在线空间”，各种学术的、时政的信息在此流动，它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是三家村先生们所体会不到的。它是京师文化的组成部分，士人们在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这个传统代代相沿，为后来康梁变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